

上海电影研究文丛

主编 陈犀禾

历史变迁与文化转型

昆仑影业公司发展研究

褚亚男 著

CIP

中国电影出版社

历史变迁与文化转型

昆仑影业公司发展研究

褚亚男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3·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变迁与文化转型：昆仑影业公司发展研究/
褚亚男著. -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2. 4

(上海电影研究文丛)

ISBN 978 - 7 - 106 - 03473 - 3

I. ①历… II. ①褚… III. ①电影业 - 企业发展 -
研究 - 上海市 - 1946 ~ 1952 IV. ①J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75011 号

历史变迁与文化转型：昆仑影业公司发展研究

褚亚男 著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邮编 100013

电话：64296664 (总编室) 64216278 (发行部)

64296742 (读者服务部) Email: cfpvgb@126.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87 × 1000 毫米 1/16

印张/15.5 字数/226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106 - 03473 - 3/J · 1335

定 价 40.00 元

本专著系：

上海市高等教育内涵建设“085 工程”子项目

《上海电影研究文丛》

编委会

主 编:陈犀禾

编委会主任:金冠军

编委会委员:马 宁 王艳云 石 川 孙绍谊 曲春景
刘海波 张文俊 金丹元 林少雄 聂 伟
黄望莉 程 波 葛 颖 蓝 凡

总 序

上海电影曾有辉煌过去。作为中国电影的发祥地，它在中国电影的历史上有太多值得骄傲与炫耀的资本。第一部故事片、第一家电影院、第一家电影制片公司、第一部有声片等都是上海出现的；中国的第一代和第二代电影明星和导演大都在这里成长起来；《十字街头》、《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经典之作诞生在这里；1949 年之前，中国出品了三千多部电影，其中 80% 以上出产于上海。自然，数字和名单的堆砌无法完全还原当时的风采，但以上的简单勾勒，已足以让我们领略到上海电影曾经的辉煌。

新中国成立之后，上海仍然是中国电影的一个重镇，贡献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品、电影导演和表演艺术家。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应属谢晋。这位几乎见证了大半个世纪中国电影的电影大师一生创造了诸多的奇迹。他是迄今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大众电影百花奖最多的导演，他影响了几代的中国电影人，他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上前所未有的观影人次纪录。迄今为止，还少有人能够超越这位大师的步伐。谢晋是新中国上海电影的一面旗帜，也是中国电影的一个里程碑。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上海电影逐渐失去了昔日的雄浑气象。面对北京、香港等地电影咄咄逼人的态势，上海电影似乎显得有点力不从心。但是上海电影人仍然在不断努力，积蓄力量，谋求着新的机遇和发展。如今，上海电影凭借着深厚的电影文化传统、国际化大都市的身份、上海电影集团的综合实力以及中国唯一 A 类国际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所在地等优势，不断尝试新的举措，也收获了诸多有益的成果。这一切都让我们对它的明天充满期待。

上海电影如此丰富的历史与文化际遇，吸引了众多学者对它进行多方位的研究，截至当下，上海电影已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学术影响力的研究领域。通过对上海电影的考察，不仅能对上海本区域的电影进行历史钩沉与现状分析，更因为上海超越一般性地域限制的特殊影响力与示范性，从而折射和透视出中国电影，乃至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文化、政治和经济之间多元复杂的社会关系。可以说，上海电影已经上升为一个隐喻中国现代性话语的文化符号，一种审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时代编码。

作为上海地区的研究力量，上海大学电影学科对推进上海电影发展、深化上海电影研究责无旁贷。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目前，上海大学电影学科获得了博士学位授予权，是全国五个电影学博士点之一，同时也是上海市第三期重点学科。在此基础上，上海大学电影学的学科团队力图在上海电影的研究上有所建树。

本套《上海电影研究文丛》，正是上海大学电影学科中数位中青年学者和部分优秀博士的一次集中亮相。这些研究从内容上涵括了从电影工业、导演明星、影像文本和制度建构等多个视角来审视上海电影的新近研究成果。在当下中国电影强势复兴、上海电影寻求突破之际，这套丛书的发行，无论是对于上海电影的发展，还是对于上海大学电影学科的发展，乃至对于当下的中国电影研究，都希望能够起到一点推动作用。

缘此，谨写数语如上，是为总序。

陈犀禾

2010年9月于沪上

目 录

绪 论	1
一、研究缘起及文献综述	2
二、研究创新与研究方法	7
三、研究框架与预期问题	11

上 编

1945—1949

第一章 抗战胜利后“昆仑”的产业发展

第一节 战后上海电影产业发展概述	17
第二节 昆仑影业公司的创立	26
第三节 “宗记合作制片”阶段	43
第四节 香港分支机构的设立	50

第二章 “昆仑”影片的主流表达与进步意识

第一节 “史诗片”获奖	57
第二节 关于《新闺怨》的争议和重拍	61
第三节 “昆仑”女明星的银幕形象	73

第三章 “昆仑”影人的精英之路

第一节 文化精英与民族资本的整合	83
------------------------	----

第二节 影人群体的构成分析	85
第三节 知识分子气质与精英价值观	92

下 编

1949—1952

第四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昆仑”的产业调整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电影产业概述	97
第二节 新中国电影体制中“昆仑”的境遇	113
第三节 公私合营与“昆仑”的结束	117

第五章 社会主义语境中“昆仑”影片的银幕表达

第一节 歌颂“工农兵”的文化语境	123
第二节 拍摄历史传记片《武训传》	125
第三节 改编小说《我们夫妇之间》	154

第六章 新中国“昆仑”影人的改造之路

第一节 文化精英与主流政治	179
第二节 “昆仑”影人的境遇分析	190
第三节 文化改造与自我反省	199

结 语

一、产业分析与文化定位	209
二、史学评价	213

昆仑影业公司大事记

参考影片

参考文献

致 谢

绪 论

昆仑影业公司在中国电影史学视域中有两大要点:第一,它被叙述为抗战胜利后共产党领导的进步电影的基本阵地,是20世纪40年代进步电影运动的核心力量,与20世纪30年代的“电通”所具有的左翼电影文化特征一脉相承;第二,“昆仑”出品的电影,如《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新闻怨》、《万家灯火》、《乌鸦与麻雀》等所呈现的文化气质与经典写实主义风格被纳入革命现实主义的表现序列中,是与进步电影文化内核具有同质关系的文化产品。正是在以这两大要点为主导的电影史叙述中,大部分研究以1945—1949年的“昆仑”为对象,对1949—1952年的“昆仑”发展过程略而不谈,或只做简单的陈述。在这种研究现状下,完整地叙述“昆仑”的发展历史就成为一种学术尝试。

纵观“昆仑”1945—1952年的发展历史:新中国成立后,“昆仑”的产业体制、影片风格、影人命运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秉承阶级史观的电影史学家的视野中,1949年之前的“昆仑”出品被纳入到中国经典影片之列,而1949年之后的影片则被主流文化所排斥,如《武训传》和《我们夫妇之间》在当时就受到广泛的批判。在以阶级史观为主导的历史叙述中,“昆仑”1949年之前的出品获得高度评价;1949年之后具有同样风格的作品则受到严厉批判,至今仍在学术界引起广泛的争议,这现象本身就体现出阶级史观的局限性。实际上,1949年前后的“昆仑”影片在拍摄手法、影像风格和文化内涵等方面都传承了上海电影传统——既借鉴了中国早期“影戏”的叙事策略,又深受好莱坞电影的影响。但在阶级史观的观照下,这些影片不仅没有被放置在“昆仑”发展的完整历程中来描述,甚至自身所传承的“昆仑”传统也被抹杀了。取而代之的是,具有同样文化品格和影像风格的“昆仑”作品,被割裂为两个截然不同的序列——1949年之前的作品是进步电影的典范

之作，1949年之后的作品则是与主流意识形态相抵牾的、不合时宜的。

因此，长期以来“昆仑”的产业体制、文化事件、影人命运无法被纳入一个完整体系中进行系统的观照。在重写华语电影史的学术倡议下，将“昆仑”被割裂的历史进行整合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重新认识昆仑影业公司的发展历史，是对特定时期产生的历史文化观的一种学术反思，但这并非意味着用一种史观去否定另外一种，重点在于说明不同历史时期对于“昆仑”的历史描述和评价是不同的，它反映和折射出的是整个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因素对电影发展的影响与制约。对于“昆仑”命运的历史反思和重构更多地是基于一种开放的历史观念，要尽量避免一种狭隘、单纯地摒弃阶级史观的学术思维，从而将这一研究拓展到更加广泛、多元的学术范畴中。不过，对于“昆仑”的研究仅仅是一个开端，目的在于引起学界对阶级史观指导下已经形成定论的一些历史现象进行全面、深刻的文化反思，这种反思对于当下以及未来的电影研究来说具有极其深远的启示意义。

一、研究缘起及文献综述

21世纪以来，电影学界提出“重写电影史”的倡议，上海大学陈犀禾教授认为重写电影史的实质，乃是“另写”，任何一部电影史都不应该是对另一部电影史的“重写”、“注疏”、“校正”、“纠偏”，而是对整个电影历史研究领域的补充与丰富。^①

在如此开放的研究态势下，“昆仑”的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契机。2007年5月，《电影艺术》在“理论争鸣”板块发表了《关于中国电影史学研究的谈话》，参与谈话的有北京电影学院的陈山、钟大丰，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吴迪（启之），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的李道新和《电影艺术》的主编吴冠平。电影史学家吴迪在谈话中提到的一个现象引起了笔者的注意。他讲述自己在1948年2月《大公报》上看到的一则新闻：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张道藩为首的上海文化运动委员会主持的优秀电影评选工作，从10个公司22部电影中选出10部优秀影片，其中包括《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遥远的爱》、《松花江上》等6部“进步电影”，这些电影和其主创者还获得了“中正文化奖金电影奖”。这件事刊登在1948年2月8日的《大公报》上。同年2月8日至20日的《铁报》连续十几天报道评论此事。

^① 陈犀禾、刘宇清：《重写中国电影史与“华语电影”的视角》，载《学术月刊》2008年第4期，第87页。

《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皆为“昆仑”出品，吴迪提出的有关问题在挖掘、分析与“昆仑”有关的史料层面提供了一条很有意义的线索。电影史学研究者是否应该以此为起点全面搜集、整理与“昆仑”相关的报刊、档案等史料，重新审视40年代“昆仑”及其影片的文化政治。另外，杜云之的《中国电影七十年》中记载国民党政府迁往台湾后，也曾经反省对“昆仑”电影创作所给予的宽松环境，认为“昆仑”作品的舆论影响力不亚于一个坦克师。^①看来，国民党政府对“昆仑”的文化影响持高度的警惕性且伴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发生了改变。因此，在分析“昆仑”所面临的政治形势及其应对策略时，应该在掌握丰富史料的前提下将这些思考列入研究的范围之内。

对史料的重新考察必定以史观的转变为前提，分析此次谈话的背景不难发现，这是继2005年，也就是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之际电影史学研究高峰之后，由电影学术刊物发起并组织的一次关于电影史学观念、研究范式、学术规范等切中目前研究时弊的极其严谨、中肯的学术交流。此次谈话对电影史研究的史观、史料搜集与运用、史实认定等问题展开讨论。参与谈话的专家在构建中国电影整体史观的基础上深化微观研究，并且向纵深方向发展这一点上基本达成一致。这意味着自80年代以来主要受到西方史观影响而逐渐兴起的电影整体史观正在受到更理智和细化的深层次学术反思。

同时，在宏观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的研究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重新认定史料、重新思考历史事件的发展脉络。关于史料，应尽可能地进行“祛魅化”处理，鼓励一种开放式的研究，不断结合新的材料和观念，以一种反思性的实证精神，重新发掘和解释历史证据，努力使理论研究假说中的结论与已知的世界协和一致。^②

在此基础上，电影史应进一步关注历史发展的系统性，对其因果关系做出解释，不能像传统电影史研究那样，把目光仅仅停留在影片之上，而要扩展到影片之外，甚至电影艺术之外。“但是，当史学家所关注的不只是电影的历史而更重要的是历史中的电影时，其研究的重点随之由文本移向泛本文，电影的历史研究逐渐演化为历史的电影研究，电影的历史写作最后成为

① 杜云之：《中国电影七十年》，（台湾）电影图书馆出版部1986年版。

② 参见丁亚平：《史学意识、实证理性及其自我确证的要求——论60年新中国电影史学话语的演进》，载《文化艺术研究》2009年第5期，第188页。

历史的电影写作。”^①

这也正是西方电影史学转向的过程中被高度重视的问题，史料的挖掘仅仅是重写梳理一段历史的开端。从西方电影理论的历史转向来看，学术界在强调掌握档案资料和第一手资料的重要性之外，更重要的是提出问题，而不仅仅局限于事实的考证、资料的考据、被遗忘的文本和人物的钩沉以及简单的史料归纳整理；同时，这种“‘历史转向’中的另一个特点是关注‘媒体特性’的单纯电影史写作向文化史和社会生活史的过渡。如果说风格、语言、叙事和工业体制的探讨往往带有就电影谈电影的局限的话，那么，把电影摆在社会文化和技术变迁的大语境下加以考察，则有助于我们充分认识电影这一结合了现代工业和商业美学的媒体形式在社会和文化转型过程中的力量。”^②

电影史学界开放、多元的研究态势带来了活跃、积极的研究氛围，自2000年至今，出现了多篇以私营电影公司为主题的研究文章。如孙蕾的《明星影片公司：1922—1937》、金铁木的《文华影业公司：1946—1949》，这两篇文章均收录在陆弘石主编的《中国电影：描述与阐释》一书中。上海大学黄望莉的博士论文《从都市景观到革命呈现——文华电影研究》（2009）针对创办于20世纪40年代的“文华”的发展历程进行研究，并从文化层面对其作品风格进行历史反思。复旦大学影视文学专业的博士生近年来也十分关注电影公司史的相关课题，他们对于中国电影史上曾经呈现三足鼎立之势的“联华”、“明星”、“天一”的发展过程进行了重新梳理和历史定位，如郭海燕的《中国现代电影史上的“新派”——联华影业公司研究》（2009）。艾青的《中国电影事业的开拓者》（2010）和周倩雯的《中国商业电影的世俗演绎——天一影片公司研究》（2010）。

从上述学术成果来看，目前电影学界的公司史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研究范式、研究框架也都处于不断完善和创新的过程中。同时，对于中国早期电影公司研究的难点在于重新对其进行历史定位和价值判断。陈墨、萧知纬在对长城画片公司的研究中通过对已有的史述进行梳理后发现，电影史家将“长城”公司的转向说成是由于他们自身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这时已经无力抵抗武侠神怪片潮流的冲击，而开始走向没落，进而得出结论说“长城”的没落，是历史的必然，“长城”的失败，再一次说明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力量无力负担电影文化革命的任务。这样的分析和结论，虽然冠冕堂

① 郦苏元：《关于中国电影史写作走向的思考》，载《当代电影》2005年第5期，第21页。

② 孙绍谊：《电影研究的“历史转向”：理论与方法》，载《当代电影》2009年第4期，第82页。

皇,但未免失之简单粗略和空洞,实在难以让人信服。^①其实,如果细心整理早期电影公司的史述会发现,类似的情况还很多。“昆仑”的研究也面临着如何突破以往的历史定性,使这项研究更具学理化并向纵深方向发展。

造成“昆仑”史述意识形态化的原因,和中国电影史发展的时代文化背景有密切关系。按照高小健的划分,中国电影历史研究的角度和方法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变化:五六十年代,对中国电影史的研究呈现出以社会政治话语为主题的历史阐释;八九十年代,对中国电影史发展中文化和艺术传统的回归;而当下,研究的方向又转向对中国电影商业发展的历史的初步认知。^②五六十年代是对“昆仑”发展历史描述意识形态化的一个高峰,当时电影史学界所秉承的史观就是以《中国电影发展史》出版以来所确立的阶级史观,它要求电影史的撰写者具有明确坚定的阶级史学观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完成对电影公司、电影运动、电影事件、电影人物和电影作品的历史评价。按照陈山教授的认定,《中国电影发展史》是“官修的正史”,并且“该书创立了中国电影史学的一种方式,即电影思潮史的研究方式。这部电影史注重电影的意识形态研究,强调电影的社会文化形态,着力于电影艺术的社会价值判断,并以一种社会发展史观来观照电影艺术演进的轨迹”。^③

因此,从60年代至80年代,阶级史观成为一种主导的电影史学观念,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中国早期电影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电影的商业性、民营电影公司的企业特性也相应地处于被贬抑的状态。在阶级史观统领电影史研究的阶段中,“昆仑”的企业性质几乎全部被抹杀,而突出它的社会意义。阶级史观视域中对于昆仑影业公司的历史研究宏观上具备公司史研究的要素,涉及产业体制、出品数量和质量分析、人员的组成和流动,但实质上却是将“昆仑”作为为左翼政治话语代言的文化机构来进行意识形态化的描述。在这种历史价值判断的前提下,电影史学家在一定程度上承认电影公司作为经济实体的存在;另外,阶级分析的方法又不允许对电影公司进行过多的商业分析。不过,“昆仑”依然被放置到20世纪40年代电影公司林立的商业环境中进行描述,并且关注观众对于电影发展的影响。源于时代的影响和政治的环境,包括电影的生产、发行、放映和接受层面的整体史学叙

① 参见陈墨、萧知纬:《跨海的“长城”:从建立到坍塌——长城画片公司历史初探》,载《当代电影》2004年第3期,第42页。

② 参见高小健:《新中国以来对中国电影历史的复读》,载《当代电影》2004年第1期,第52页。

③ 陈山:《电影史学的建构——对〈中国电影发展史〉文本的史学研究》,载《电影艺术》2008年第6期,第102页。

述停留在阶级分析的层面，历史评价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意识形态功能。

进入 21 世纪以来，传统的以阶级史观为主导的局面逐渐被打破，代之而起的是多元化的史观，对于“昆仑”的研究也就进入了一个趋向本体化的阶段。电影史研究专家丁亚平认为“昆仑”所出产的“进步电影”需要作广泛的理解与阐释：它既可以表现为对当时的社会起一定的作用，从而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历史前进，也可以是着意对当时的文化、真实的人生进行探讨，而并不仅仅是对当时的政治起作用。^① 此时，进步电影是被放置在与正统电影、商业电影共同组成的战后电影格局中被描述的。昆仑公司则是这个格局中被国民党当局认定“……‘左派在上海建立的宣传据点’，是‘清一色的左派电影公司’。但客观情况却是，不止是昆仑公司，就是国民党自己可能认为是右派（正统甚或民营）的电影公司，也不乏大量‘左派’的存在与活动。”^②

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华东师范大学的两位硕士研究生也关注了昆仑影业公司的研究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汪朝光教授的学生贡改改的论文——《茫茫银海巍巍昆仑——昆仑影业公司始末之研究》是一篇较早地利用档案、报刊等一手资料对昆仑影业公司进行研究的专论。文章从昆仑公司的成立背景与经过、公司内部运作机制、电影出品概况及其艺术分析和市场反应、影人创作群体等方面来探究昆仑影业公司取得的突出成就与存在的若干不足，分析其间之利弊得失，对昆仑影业公司在中国电影史上予以恰当的定位与评价，并以此观照战后中国电影的基本状况及其在中国电影史上的位置。^③

华东师范大学陈子善教授的学生朱宇琛完成的《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昆仑影业公司始末新探》与贡改改的论文相比，观点更为鲜明，立场也更为明确。这篇论文的特点在于明确地表示，昆仑影业公司与其他民营企业不同的是，它具有深厚的政治背景。自“昆仑”组建伊始，以阳翰笙为代表的“昆仑”核心创作成员和以任宗德为代表的主要投资方都曾受到周恩来的直接召见。从创建目的、人员构成到作品主题，“昆仑”都带有不容忽视的政治意识形态诉求。这构成了“昆仑”的一个特殊标记，以民营电影企业的

① 参见丁亚平：《影像中国——中国电影艺术（1945—1949）》，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87 页。

② 丁亚平：《影像中国——中国电影艺术（1945—1949）》，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87 页。

③ 参见贡改改：《茫茫银海 巍巍昆仑——昆仑影业公司始末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硕士论文，2004 年，引言。

姿态背负了不可推卸的政治任务。^①

上述两篇硕士论文在史料的搜集、利用,史实的认定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且均为“昆仑”发展史的断代研究范畴,不免还有极大的突破空间。近年来,关于“昆仑”的专论不多,博士论文领域目前还未见对“昆仑”进行专题研究,绝大多数对于“昆仑”的描述或评价都散见于电影史研究的书籍或论文之中,篇幅不多,研究也不够深入。因此本书将针对昆仑影业公司在1945—1952年间的兴起、发展、衰落的具体过程,以及在期间发生的重大文化事件、电影人群体在文化政治层面的特征进行分析。目前,中国电影研究已经逐渐跳出传统史观的束缚,逐渐走向更加开放、更加多元化的史学观照层面,因此,对于昆仑影业公司的研究应该从史料入手,全面分析,而不是先下定论,再用史料加以佐证。只有秉持客观的研究态度,才能还原历史,接近昆仑影业公司发展的历史真实。

二、研究创新与研究方法

大部分电影史的写作以“昆仑”1945—1949年的发展为主要书写对象,对于1949—1952年“昆仑”的发展略而不谈,或只在通史中做简单的叙述,这一段历史只能在《当代中国电影》、《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等著作中找到只言片语。孟犁野在《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中用简单的语言对“昆仑”1949年后出品的电影进行了概述:“1949—1952年间,共拍片三部,除《人民的巨掌》比较概念化外,《武训传》与《我们夫妇之间》都是为文化界所知的富有特色的作品。”^②陈荒煤在《当代中国电影》中撰写1929—1952年间私营电影企业的成就时也提到了《我们夫妇之间》,但是对于《武训传》仅仅是作为电影文化事件来描述。值得注意的是,2006年11月第1版的《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延续了陈荒煤将《武训传》作为电影文化事件的书写方式,并没有将这部电影放置在“古装/历史/传记”一章中,而《宋景诗》则列入其中,这一微妙的统筹令人遐思。

另外,在中国电影史的著述中,很多学者对1946—1949年“昆仑”影片的评价明显优于新中国成立后的“昆仑”电影。1946—1949年的“昆仑”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上的数部经典之作:《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

^① 参见朱宇琛:《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昆仑影业公司始末新探》,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第1页。

^② 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年版,第68页。

流》、《万家灯火》等。这些影片成为电影史学家浓墨重彩的对象。然而，“昆仑”的命运随着新中国的成立，逐渐进入充满困惑的转型期。随着“工农兵电影”的口号提出，深受上海电影传统影响的昆仑影业公司力求融入社会主义文化范畴中，但是对那些深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的影片来说，“昆仑”出品的部分影片在当时受到了广泛、严厉的批判，其中一些影片至今仍然饱受争议。

针对以上研究现状，完整地叙述“昆仑”1945—1952年的发展历史，本身就是一种新的学术尝试。纵观“昆仑”的发展，它跨越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一历史转折点，经历了国民党政府和新中国政权两种不同的文化、政治时期。只有完整地看待“昆仑”的发展历史，全面理解新中国成立后“昆仑”在产业、文化上的发展，才能展现“昆仑”的全貌，对其历史命运的转变给予理性、客观、深入的学术分析。

本书将依据新挖掘的史料，以“昆仑”1946年成立为时间起点，到1952年被纳入国家公有制体系中为止，按照产业体制、文化事件、电影人的框架对其发展过程进行历史考察。不过，影片风格和艺术特色不再成为书写的重点。“昆仑”出品的影片有些成为经典已经达成共识，无须赘述。本书着重以梳理史实为主导，以文化事件为核心，力求做到从点到面，从文化事件所显示出现象出发来探究“昆仑”的文化形态，进而探讨“昆仑”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命运发生转变的深层原因。

在研究的过程中，分析“昆仑”文化事件的背景、成因、过程及影响成为本书的重点，此种研究将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昆仑”的不同境遇作对比，这种方法不仅具有历史的直观性，而且通过对文化事件的成因分析，“昆仑”在复杂政治环境中的文化特色也将会凸显出来。关于历史事件的研究，在史学界早有过比较多的讨论，无论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史学研究，都经历了一个从关注宏大叙事到微观层面的过程。在西方电影史学研究范畴，传统的史学观点认为：电影史学者的基本任务就是挖掘未知的电影和已知电影的未知事实，然后建立、调整、维系我们关于电影历史文化的价值判断。“二战”以后有大量的电影史学者，例如乔治·萨杜尔、让·米特里、乌尔里希·格雷戈、埃诺·帕塔拉斯、耶尔兹·托普利兹等人进行了基础性的电影史编纂工作。他们的著作主要是基于地域性的，而且他们关于一个国家的电影是否成熟的判断主要基于产业而非艺术。他们认为基于美学所建立的电影史总有一个问题：判断具体电影文本艺术质量高下的标准是因人而异的，所以难免有疏漏。